



Goujian

Zhongguo Shehuizhuyi Hexie Shehui
Yu Zhengzhi Jianshe

构建 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与政治建设

杨海蛟 等著

 世界出版社

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与政治建设

杨海蛟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政治建设/杨海蛟等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012-4595-6

I. ①构… II. ①杨…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2317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马莉娜

书 名 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政治建设
Goujian Zhongguo Shehui Zhu yi Hexie Shehui yu Zhengzhi Jianshe

作 者 杨海蛟 等著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电 话 010-65265923（发行） 010-85119023（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内文排版 北京世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87×1092毫米 1/16 24½印张
字 数 412千字
版次印次 2014年12月第一版 201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595-6
定 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社会和谐是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和理想目标。自从构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提出来之后，国内研究者在对和谐社会的理论渊源、精义、目标、本质特征、指导思想、原则研究的同时，根据中国国情和社会现阶段的特征献计献策，就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设想。其中有的学科和学者以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为切入点，着力研究如何完善社会分配制度，逐步消除因收入差距扩大、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不和谐因素，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有的学科和学者主张加强社会管理、社会建设、完善公共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关注、救助社会贫弱阶层，让改革开放的成果为全体人民享受，实现社会和谐；有的学科和学者建议高扬公平正义的旗帜，做到立法、司法公正，实现权力和权利的平衡，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规范政府行为，使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保障社会和谐；有的学科和学者，力主倡导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尤其是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和发展，以此引导、保障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目标，保障社会主义中国和谐的本质特征和重要原则能够得到体现和落实，使和谐社会有强劲的精神动力和支柱；也有的学科和学者，针对社会道德、规范严重缺失的情况，提出应当建立和健全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彰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风尚、道德品质，形成社会行为体的行为导向和内在约束力。

政治学界围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主题，也进行了一些研究，更多的研究成果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从政治学的视野，观察和分析和谐社会问题，普遍认为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矛盾和冲突的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将矛盾和冲突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控制在秩序的范围

之内；和谐社会不是一种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社会状态，社会和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目标和过程的统一。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要的是要实现政治和谐，应当将政治建设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切入点，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政治保障。上述研究成果，对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课题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运用政治学基本原理，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国内外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全面分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政治方面的具体要求和重要体现。通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分析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社会政治心理及其变化情况，把握其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体系间存在的异同，从而进行必要的利益调整，以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整合，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强劲的动力；论述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创新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具体思路：根据时代特征和形势任务，说明政治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突破为实现社会和谐，把着力点仅仅局限于收入分配或者类似方面的认识，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完善民主法制制度、提升政府能力、协调政治关系以及确立和弘扬政治价值体系等方面提出具体的设想和建议。但理想并不等于现实，由于能力有限，展现在大家面前的研究成果，还很不理想。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政治建设.....	1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2
二、政治学视野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7
三、政治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6
第二章 执政党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51
一、执政党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	51
二、国内外执政党构建和谐社会的经验	68
三、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维护社会和谐进程中的经验教训.....	79
四、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	89
五、以执政党建设促进和谐社会发展	101
六、新时期对社会和谐的新挑战	119
第三章 完善政治制度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30
一、政治制度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30
二、和谐社会视野下当前政治制度的成功实践与不利影响	159

三、完善政治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87
第四章 建设服务型政府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34
一、和谐社会与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契合与关联	234
二、新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服务型政府	256
三、当前我国政府在应对挑战时的困境	273
三、基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281
第五章 以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301
一、政治价值与社会和谐.....	302
二、中国以政治价值体系引领社会和谐的经验与挑战	320
三、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342
参考文献.....	372
后 记.....	385

第一章 构建中国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与政治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以及新世纪新阶段的机遇和挑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中共十八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属性。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共同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以政治建设为切入点观察和思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利于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重大战略选择的历史必然性，有助于进一步把握规律，着眼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因此，探讨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一重要论题，必须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政治建设的关系。只有准确把握二者的科学内涵，深刻理解二者的相互关系，才能从根本上为构建社会和谐提供重要理论指导、制度保障和动力源泉。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相关,当前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许多长期积累的矛盾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同时,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也凸显出更多直接关涉不同地区、行业、阶层权益保障和利益分配的矛盾,虽然这些矛盾冲突的性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但认识与处理这些新时期面临的各种问题仍然是和谐社会构建任务提出的一个现实条件。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展开:

其一,经济发展领域内的问题。毋庸置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活力,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进步,如今,以经济总量为显著标志的经济实力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足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基础的薄弱与伴随跨越式发展而带来的问题,也是在分析和谐社会构建经济条件时不可忽略的因素。虽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国已经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这主要还是由现实的发展状况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决定的,并且这一判断也直接对构建和谐社会任务的提出产生了影响。就其完整内容而言,和谐社会的含义是指“物质产品丰富、人民生活富裕的社会;社会系统内部之间、自然、人和社会之间互相融洽、彼此协调、关系良好、有机整合、社会运行没有冲突的状态,这是有机统一、和谐互动、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①很显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三者之间密不可分。其中,集中体现了物质文明建设成果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建设工程直接为和谐社会

^① 李本松:《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层哲学内涵》,《天府新论》,2006年第1期,第30—32页。

的构建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的物质支持,同时其目标的达成状况又反过来成为了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任务目标的制约因素。具体而言,以小康社会建设为集中体现的经济发展与构建社会之间的联系表现在:(1)经济状况从根本上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在经济发展未达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和谐社会的建设充其量不过是人类政治理想中的又一个乌托邦而已:“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前提,是因为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①当前,中国已经实现的小康还是一种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不仅在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上存在着与发达国家的相当差距,而且在经济发展的地域均衡性、成果分配的合理性等方面也远未尽如人意,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继续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②仍然是一个进行时中的任务,从长远来看,也只有经济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和谐社会的建设才可能获得坚实的基础。

(2)中国当前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与和谐社会构建任务目标直接相关。在肯定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处于转型发展时期,面临着历史旧账与现实竞争的双重压力,一系列经济发展中的新老问题也随之交织在一起,构成对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挑战。事实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诸如城乡、地域发展不均衡、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体系不合理等问题早已超出经济领域,很显然,这些问题并不能依靠单纯的经济发展得到彻底解决,从某些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实例来看,放任这些问题的积累甚至有可能迅速反噬已取得的经济成果。很多情况下,政治建设与经济的相关性就表现在政治领域内的调整变革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样,和谐社会任务目标体系中涉及统筹兼顾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压力、处理不同地区、行业、部门、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与相互关系,致力于避免出现两极分化和社会不稳定情况等内容也与解决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呈对应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②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系。简而言之，中国经济进一步提升发展水平的任务提出了通过对发展中一系列政治、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以扫清障碍的需求，而这些需求恰恰以政治建设目标的形式反映在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随着和谐社会构建中这些问题的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就能够相应的突破目前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局限，沿着更合理、平衡和可持续的道路实现跨越发展。

（3）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任务的长期性决定了和谐社会任务建设的长期性。客观地分析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难发现，其中许多发展不平衡、结构关系不合理的问题都并非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本身所带来的新问题，而是历史上存在的地区、阶层等差别长期积累的结果。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对中国共产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始终坚持。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相同，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并非一蹴而就之事，也不能不受限制地实现“跨越式进步”。在实践过程中，领导和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需要依据不同时期的核心问题，依托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提供的现实条件和现实问题，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内容等分解为不同阶段内需要达成的任务目标体系，并在其过程中探索和谐社会构建本身的规律。此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相应的提出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的需要，而这恰是和谐社会构建的中心任务。很显然，由于这种问题的动力机制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相伴始终，也就决定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此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国际环境的变化，也是新时期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的重要背景。就国际环境的有利方面而言，从总体上看，随着冷战的结束，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多的是以一种经济领域内竞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经济竞争本身常常并不是零和博弈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有利于保持国际局势的整体和平稳定。但与此同时，国际环境变化过程中也提出了一系列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事业的挑战，首先是少数发达国家维持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意愿与能力仍很强大，世界朝向多极化方向的发展不可能十分顺利，甚至还可能在短期和局部范围内出现霸权主义占据上风的局面。其次是面临着国家间经济竞争的巨大压力，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对市场、资源等的控制

权，操纵国际金融，制造贸易壁垒，向其他国家转移国内生产和就业等经济压力，从而使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放缓，并导致其结果更加不利于广大后发现代化国家。^①

其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仍然十分激烈，危及社会和谐。随着苏东解体剧变，西方世界开始集中力量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不屈从西方压力的发展中国家，施展从国际政治施压、到经济侵略破坏，再到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腐蚀渗透等颠覆手段，借推进思想文化领域内“多元化”、“自由化”趋势之名肆行排除异己之实。此外，由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民族、地域、文化等差异因素所挑起的社会矛盾冲突也对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而破解上述诸多困扰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不断改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具体问题，促进社会结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朝向更加合理优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从源头上将大部分可能出现的矛盾冲突化解于萌芽阶段，为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大局创造一个尽可能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惟其如此，才有可能保证整个社会主义发展事业在外来压力与挑战面前始终岿然不动。

邓小平反复强调：“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②“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③“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什么也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会失掉。”^④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本身，都需要和谐稳定的政治环境创造条件。综观近代以来的历史，由于忽视了相应的社会建设工程，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断裂，直至引发国内民族、宗教、地区间大规模对抗冲突，导致业已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毁于一旦的实例并不少见。如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南美诸国以及近年来西亚非洲部分国家所经历的始于由执政当局忽视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所引发的社会危机，终于使发展成果付诸东流、社会结构矛盾

① 张建：《人类追求和谐的脚步》，《半月谈》，2006年第16期。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雪上加霜,甚至整个民族国家共同体分崩离析。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不相适应的情况,但究竟是采取回避压制矛盾的消极态度,还是直面具体问题,在实践中寻求科学的解决之道,其结果大相径庭。也正是有鉴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忽视社会建设的教训和认识到中国当前发展中尚存的种种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才得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任务目标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资源消耗过度、投入与产出比不尽如人意、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巨大,以及地区、部门、行业等发展不均衡、为改革发展所作贡献与其分享的收益果实不对等方面的问题,^①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对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从长期来看,还可能超出经济问题领域转化为社会、政治问题,给整个社会主义发展事业造成危害;在社会发展领域内的问题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不断完善,社会群体间涉及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及阶层间的流动性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不同阶级阶层参与社会管理事务的意愿与能力同步增长,而建立在旧社会结构基础上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求。在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与促进快速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下,各阶层间经济交流广度、深度与频率的增加必然伴生出诸多矛盾冲突,现有的应对制度机制的作用效果与理想期望值间仍存在着较大差距。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各种腐败问题的存在,在某些领域内,阶层身份的固化趋势已经开始出现,这无论是对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还是对于促进各阶级阶层间关系的和谐、构建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求的合理社会结构,都有百弊而无一利;在民主法治建设领域内的问题。众所周知,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内的诸多问题需要依靠政治发展领域内的进步得到根本和彻底解决。无疑,当前中国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民主要求相比,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水平相比,现阶段中国民主法治建设领域内仍存在着诸如现有的民

^① 胡锦涛在200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主制度缺乏灵活、有效的实现机制、各层次民主发展尚未构成完整均衡的链条系统、民主与法治的原则和精神在某些情况下仍未得到充分的尊重与落实,在政治生活中遵循民主原则进行的政治沟通与协调渠道不够顺畅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目标的实现,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正确处理发展中各领域矛盾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既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基础,也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了现实要求,在这样一个以变革为主要特征的时代,随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发展,分属彼此界限日益清晰的不同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的社会成员对其利益诉求和社会定位的认识与实践中也随之出现了更多涉及保持政治稳定和谐问题的不确定因素,如果这些因素不能得到充分的重视,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就将不仅是和谐社会局面的破坏,很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毁于一旦。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重点解决部分社会群体和个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对被剥夺感和挫折感问题为重点,积极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问题,是作为中国政治发展进程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提出和践行和谐社会构建任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政治学视野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众所周知,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以来,理论与实际工作者纷纷献计献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提供理论支撑和理论服务。运用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观察和分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是政治学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毋庸置疑,在社会生活领域,政治是其基本要素,也是最为核心的要素。从很大程度上,如何从政治发展的战略高度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政治建设的具体进程思考和推进社会和谐,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成败。因此,从政治学的视角观察、分析和揭示社会和谐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来源、形成与发展

社会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和追求的价值目标。“古往今来,‘和谐’这一范畴在东、西方思想史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丰富的关于和谐社会的论述和构想,这些思想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的文化底蕴。”^①这些思想尽管都带有不同作者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的印记,但仍在一定程度体现出了普罗大众对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望。挖掘、梳理和阐释中西方传统思想中的和谐理念,是全面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对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念

中国的和谐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商周时期,金文《史孔盃》中就有“史孔乍和”的说法,这里“和”有“调、相应”之义;“谐”字则最早应见于《尚书》中《尧典》、《舜典》中,所谓“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与“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中的“谐”即指“和洽、协调”;“和谐”作为一个完整概念最早可见于《后汉书·仲长统传》中《昌言·法诚》一篇中:“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依。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不难理解,“和谐”在这里是指政令畅通、不相抵牾,是和洽、协调、相应之义的具体化。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和”、“谐”、“和谐”的含义“并无特别重大的差别,相反毋宁说其含义基本相同或一致,即都是指人类社会和人际之间及人与自然或自然之中的两种因素或事物、方面的和洽、协调、和平等情况或状态,实际上这也是事物矛盾诸方面之间的所具有的并表现出的与对立、冲突、抗争、否定、乖离等相反事物之融合、协调、互助、合作、同一、统一、均衡、和洽、欢乐等倾向、趋势或性质。”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和谐”理念一经提出,就获得广泛认同、应用极广,随着历史变迁,和谐思想日益丰富。毋庸置疑,和谐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意识,深深地印刻在中国人的自然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上,是最具民族特色的精神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杨义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首先,“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然万物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的总体认识。对于自然万物,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应该从其“化生”之中理解其本质。老子曾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五章》),孔子认为“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而《易传》更是提出了“生生之谓易”的著名论断。这种将“生”作为自然万物本体的思想,不但阐明了宇宙万物千变万化的原因,也孕育了兼顾“参天地”而“赞化育”的“天人合一”思想。早在公元前700多年,史伯就提出了“和同之辩”,认为和生物、同不继是世间万物存在发展的本质所在。在今日看来,这种“和生物”的观点无疑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疏“矛盾”而近“和同”的思想基点,不同于西方哲学中对“斗争性”、“二元性”乃至“矛盾性”的自然哲学观。正因如此,《中庸》才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庄子则认为天地“二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庄子·田子方》),而荀子更以“列星随旋,日月递昭,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礼记》)一言明白无误地揭示了“天地合和,生之大经”的自然哲学观。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宇宙间之万物,全由于阴阳、天地、夫妇的合和交感而生,而不是二者的抗争或悖害。”^①这种“自然和谐论”,表达了中国古人对宇宙生发演变的抽象认知,奠定了“心精遍圆,含裹十方”的自然和谐思想的基础,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为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学说。

其次,“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思维方式的内核及其基本准则的根本体现。关于宇宙、万物及其运行的思考,不仅产生了“和生物”、“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观,而且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有学者就指出:“对传统文化的深入讨论,必将涉及思维方式的问题,因为思维方式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最高凝聚或内核。换句话说,思维方式是一切文化的主体设计者和承担者。”^②思维方式不是抽象的程式,而是历史的产物,是“由知识、观念、方法、智力、情感、意志、语言、习惯等八大要素组成”^③的。通过观察和解释世界万物,中国人从“和生物”的自然观中抽象出了“致中和”的思

① 王永祥:《古代和谐范畴与社会主义和谐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② 蒙培元:《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哲学研究,1988年第7期,第53页。

③ 陈新夏、郑维川、张保生:《思维学引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4页。

维方式。具体而言，这又包括两层意义。其一，致中和是追求中道、中庸、中正。相传，尧教导舜时曾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篇》），舜又以此告诫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讲得都是观察思考问题时应做到不偏执、守适中、达中正。《礼记·中庸》中明确提出了“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认识论思想。先秦诸子秉持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致中和”的思维内容，诸如“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晏婴）、“过犹不及”（孔子）、“知和曰常”（老子）、“思虑以和”（荀子）等都是其具体内容。后世中，致中和成为评价圣主君子的思维品性标准。那么，究竟什么是致中和（中庸），二程和朱熹都有明晰的表述，前者说“中者只是不偏，偏则不是中；庸只是常，尤言训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后者则说：“中庸只是一个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谓之‘中’，以其不差异可常行，谓之‘庸’”。其二，致中和不是形式的中道、中庸、中正，而是追求恰到好处的中道、中庸、中正。没有标准的中和就意味着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维”绝不是形式的折中。孔子说的“和而不同”虽讲的是人与人的和谐之道，但实则反映了“中和”是在品行、道德、关系、行为等方面有所判断、断乎取舍的“中行”之辨。因此，他说“中庸之为德也”（《论语·雍也》）、“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孔子家语·正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致中和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并没有停留在“抽象层面上”，而是联系实际、因对象而言说的实践性思维方式。正如二程所言“随时处宜，只是正得当时事”（《二程全书·遗书》卷十五），而朱熹则指明“各正其分，各得其理，便是顺利，便是和处”（《朱子语类》卷六十八）。

最后，“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群体社会的结构及其伦理纲常的理想愿景。以和谐为中心的自然观和思维方式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人对理想社会的期望与认识。颛（音zhuān）顼（音xū）、帝喾（音kù）时“和”就是作为道德规范体系的“八元”^①之一，而尧则主张“协和万邦”，及至周朝与春秋战国之时，“和”始终是六德之一^②。显然，“和”早已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为重要的道德规范。

① “八元”为：忠、肃、共、懿、宣、慈、惠、和。

② 《周礼·大司徒》中记载的六德是“知、仁、圣、义、忠、和”，而《周礼·大司乐》中的阐述的六德是“中、和、抵、庸、孝、友”。